

古代景区收不收门票,这是个问题

李开周

现代景区有免费的,也有收费的,其中收费的不少,毕竟开发与维护都需要成本。那么,古代景区收费吗?我们可以跟随清朝官员孙嘉淦的脚步,感受一下三百多年前的景区和门票。

泰山娘娘庙 “票银人二钱”

孙嘉淦,字锡公,山西人,乾隆年间名臣,当过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直隶总督、湖广总督,还做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但下面要说的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,那时候孙嘉淦还很年轻,还在翰林院当庶吉士,相当于实习生。

在翰林院做实习生不久,孙嘉淦的母亲过世了,他辞去官职,丁忧守孝。守孝期间,妻子又不幸病逝,儿子也不幸夭折,他悲痛之余,百无聊赖,便计划通过旅游来化解痛苦。

康熙六十年,即公元1721年,农历二月十四,孙嘉淦与一名科举落榜的朋友结伴,离开北京,向南进发,抵达泰安。

到了泰安当然要爬泰山,可爬到半山腰,孙嘉淦就被人拦住了。阻拦者说:“不可,山顶有娘娘庙,领官票而后得入。”(孙嘉淦《南游记》,以下凡未标明出处的,皆出于此)你们不能再爬了,山顶有娘娘庙(即碧霞元君祠),得买票才能上去,“票银人二钱”,每人2钱银子。

2钱银子是多少呢?10钱为1两,清朝1两银子的标准重量为37克,所以1钱有3.7克,2钱即7.4克。按今天白银现货每克5.8元估算,7.4克还不到50元,并不算贵。

然而,白银价格浮动极大,古代白银的纯度也较低,当时7.4克白银跟今天的真实价值不能画等号。得看当时白银的购买力及当时的收入水平。查《康熙实录》,康熙六十年九月,山东新米市价为每石纹银16钱。清朝1石的标准容积为60公升,大约装米80公斤。16钱银子能买80公斤大米,2钱银子能买10公斤。孙嘉淦去碧霞元君祠,每张门票的代价相当于10公斤大米,折合人民币仍旧是几十元的样子。

低品京官 年俸可买娘娘庙200张门票

再看收入水平。孙嘉淦为低品京官,丁忧以前的年俸只有40两。40两银子等于400钱,一年不吃不喝,只够买碧霞元君祠200张门票。

据清朝史料长编《东华录》第九卷收录某官员奏请康熙增加俸禄的一篇奏折,知县年俸只有45两,养家糊口加养马,每月薪水只够花五六天。而康熙的批复就仨字:“知道了。”后来又有大臣奏请惩处贪官,康熙说了番话,意即俸禄是不能增加的,但贪污是默许的。所以在康熙一朝,贪污之风盛行。

因此,拿官俸去衡量门票并不科学,我们更要看看百姓的经济状况。康熙年间,京杭运河北段清理淤泥,通州官员给每个民工每月发放1两,即10钱(出自康熙年间修订的《顺天府田赋考》)。也就是说,孙嘉淦去泰山买一张碧霞元君祠的门票,相当于通州民工6天的收入。这么一比较,这张门票实在很贵。

门票既为了增加收入 也是为了筛选游客

孙嘉淦最后买了两张票,跟朋友一人一张。但他们的旅游体验却很差,因为卖票的人说,今天买票,明天才能登顶。次日凌晨,孙嘉淦与同伴再次爬泰山,登顶成功已是晚上,可“男女数千,宿止道旁,燃炬以丐钱。”竟是几千名乞丐打着火把拦路要钱。之后走进碧霞元君祠,只见“正殿五间,而三门皆有铜栅,门内金钱积深二三尺,堂上有三铜牌,明末大珰所铸,余无可观,束虎廊下,石柱中断”。

从泰山下来,孙嘉淦继续旅游,历时大半年,经过9个省份,并将此番行程写成长篇游记《南游记》,但他没有再提其他景点

要不要门票。

按常理推想,出售门票既是为了增加收入,也是为了筛选游客。乾隆年间出版的《扬州画舫录》就提到,扬州一姓富翁建成一座园林,占地仅有几亩,但布局精巧,风景优美,慕名来访者众多。富翁就印制了一批长3寸、宽2寸的“园票”,让看园子的仆人出售给访客。

古代有没有不要门票、人人能进的景点?肯定有。明朝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《粤西游日记》中就说过,广西柳州的柳宗元祠堂不要门票,祠堂里的小潭“罗池”颇负盛名,他兴致勃勃地前去观赏,结果非常失望——罗池竟然变成淤塞的泥塘,塘底堆满砖石,塘面漂着垃圾。为何会这样?就因为当地官府不仅不收门票,还强迫附近百姓免费接待前来游览的过路官员。老百姓就偷偷往罗池里扔石头、丢垃圾,让它不再有吸引力。

门票始于何时?如今很难考证。按《东京梦华录》第七卷记载,北宋京城开封西郊的人工湖金明池每年农历三月会对外开放,人人可以游览,但如果要在里面钓鱼,“必于池苑所买牌子”,必须去金明池管理处买一张票。宋人笔记《麈史》则记载北宋洛阳的风俗习惯:每年春天,各私家园林对外开放,游客不管去哪一座园林参观,照



《行旅图》 (清 局部)

例都要给看园子的管家一笔“茶汤钱”,也就是小费。本质上讲,这笔小费就相当于门票。

而在宋朝以前,按乾隆年间成书的大型地方志汇编《江南通志》记载,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气温骤降,太湖封冻,湖边出现一座冰山,当地居民便将这座冰山拖到岸上,用苇席围起来,谁想进去参观,必须拿出钱来。

(文章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周夷王养马的启示

刘文基

溯源寻源,徐悲鸿先生的《八骏图》,取材于周穆王养的八匹优秀骏马。西周历史典籍《周穆王传》记载,“八骏”分别名叫赤骥、盗骊、白义、踧踖、山子、渠黄、华骝、绿耳。周穆王带它们去造访王母娘娘。后又讨伐徐偃王,一举将其消灭。八骏凯旋,功成名就,周穆王在天闲修建马厩,让它们生活在那里,给予优厚的待遇,每匹马每天供给小米一石。比八骏差一点的马,则在宫内的马厩,每天给小米八斗。再次点的马,待在宫外的马厩,每天给六斗小米。达不到上述标准的散马,每天给五斗小米。比散马还差的就是民马,根本吃不到官粮。周穆王还提拔造父专门管理马。如此一来,天下的好马都被周穆王“择优录用”,没有遗漏。这些马和它们的管理人员也按照好坏程度得到了相应的待遇。

周穆王辞世,周夷王继位,造父去世,八骏也死了。马的好坏因此没有办法区分,只能依据产地来划分。结果河北北部

的纯色马成为最上等马,处于天闲,用来给周夷王驾车。河北北部的杂色马成为第二等,待在宫里的马厩,少数用来补充王室驾车的空缺,更多的则是上阵作战。河北、济河以北的马,处于宫外的马厩,供各诸侯和周夷王的公卿、大夫和使者出行时使用。江淮以南的马为散马,不能担当大事。相应的管理人员,待遇也大相径庭,按照造父的等级、旧例办理。

周夷王末年,地方上造反者蜂拥而起。处于宫内厩中的马本来应该上战场,但它们都吃得肥胖,骄横无比,听到战鼓就腿脚发抖,看到战旗就仓皇逃跑。于是,就把宫内的马放到宫外厩中,这样,宫内和宫外的管理人员就产生了纠葛。宫内的说,我的马是用于王室驾车的。宫外的说,你们的马清闲无事,为什么比我们的马待遇高?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双方争论不休,上报给周夷王,夷王和大臣、官员都偏袒宫内的。宫外的只能窝着一肚子火。

等到和强盗相遇,宫外的马冲锋在先,打败了强盗。宫内的人又抢夺功劳,谎报

是自己的马的功劳。如此一来,宫外的管理人员和马匹都懈怠起来。强盗乘机进攻,宫内的率先逃跑,宫外的看到了,也不救援,随之逃跑。如此一来,那些高头大马都杳无音信了。周夷王大惊失色,只能派出天闲的马匹。天闲的马匹素来养尊处优,根本不愿意行动,相关人员就建议周夷王动用散马。

周夷王言听计从,管理散马的人员说,打仗需要力气,食物充分,方能才气强大。现在吃得几倍的马都不能抵挡敌人,这些吃得少又长期劳作的马,又怎么能够肩负战斗重任?周夷王恍然大悟,为自己以前的行为惭愧,派人慰问散马管理人员,给他们和天闲的人马一样的待遇,让他们上战场,但终究因为马匹太多,供给不能最终落实。

结果,四个等级的马在广阔大地自由散漫,看见庄稼就吃。农民因此种不成庄稼,年老体弱的饿死了,年轻力壮的逃跑了,加入到强盗队伍。那些马也和人一样,要么饿死,要么从盗。周夷王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但是因为没有好马而无法战斗,民

不聊生。

从周穆王的八骏驰骋、众马有为、各得其所、国泰民安,到周夷王的鱼目混珠、万马齐喑、民怨沸腾、国破家亡,这启迪我们,对马的管理与对人的管理一样事关重大,不可等闲视之,否则,后果不堪设想。千里马常有,伯乐不常有,政策和策略确定之后,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,人才的发现与管理至关重要。放之四海而皆准,各行各业如此,法院概莫能外。当然,法院的人员管理有其特殊性,必须结合司法规律,恰如其分地进行科学管理。

养马一事,不仅警示法院科学管理人,也警示我们科学管理案件。立案登记制实行后,人案矛盾凸显,如何对案件科学分类,繁简分流,让简单案件快捷审结,复杂案件得到公正处理,都需要我们结合实际,深入调查研究,认真探索解决。只有这样,才能建设好智慧法院,公正高效处理案件,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(文章摘自《人民法院报》)